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与差距

◎张　斌　邹静娴

摘要：本文观察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并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展开了对比。中国经济在2010—2012年期间跨过了工业化高峰期，此后经济活动正在从制造向服务转移。工业化高峰期以后，投入、生产和产品多个环节共同显示制造业升级总体态势良好，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有更快发展，消费、投资和出口更加平衡。这些结构变化轨迹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高度一致，表明中国仍在迈向更高收入水平的正常轨道上。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政府服务占比偏低而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偏高；私人消费占比偏低，投资占比偏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弥补这些差距需要推动“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转型，进一步提升城市化率。

关键词：结构转型　跨国比较　“补短板”

一、引　言

经济增长过程不仅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还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钱纳里等[①]（1989）指出，经济增长即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人均收入持续提高与经济结构持续变化好比是一个物体的不同侧面，有

作者张斌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邹静娴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 钱纳里，等.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本文中涉及台湾的“国家”均应为“国家(地区)”，“国”均应为“国(地区)”。

着高度对应关系。成功走向高收入的经济体伴随着高度类似的经济结构变化轨迹，不能走向高收入的经济体则不会有高收入经济体所经历的类似经济结构变化轨迹。

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广泛担心。备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会不会丧失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思路是观察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结构变化，比较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在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差异。凭借经济成长进程中收入增长与经济结构变化的高度对应关系，这些观察有助于定位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进展状况；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识别中国经济发展中哪些是增长的烦恼，哪些是真正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下文从产业和支出两个角度观察了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结构变化，并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做出了对比。主要发现包括：（1）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经济在2010—2012年期间跨过了工业化高峰期，此后经济活动正在从制造向服务转移。中国跨过工业化高峰期所对应的收入水平和工业增加值份额峰值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高度一致。（2）工业化高峰期过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取得更快发展。投入、生产和产品多个环节共同显示制造业升级总体态势良好。消费、投资和出口更加平衡，其中消费占比上升，投资占比缓慢下降，出口增速显著放缓。这些变化轨迹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高度一致。（3）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主要短板从产业角度看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与私人服务占比过低；从支出角度看可能存在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

上述发现说明，中国不存在过早地去工业化，中国经济保持在迈向更高收入水平的正常轨道上。从产业和支出两个角度观察到的短板背后有着共同的原因：政府的政策着力点过度强调通过项目建设发展经济，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关配套改革、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投入和改革措施不到位，以及对部分服务业的过度管制。补短板需要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

二、从制造到服务

绝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都会经历经济活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Herrendorf 等（2013）[①]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综述性文章细致地描述了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事实。他们的观察样本涵盖了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②]，从中得出了制造业份额随着收入增长而变化的驼峰型轨迹。当一个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8000国际美元（按购买力平价算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格）[③]时，该经济体的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实际增加值份额（剔除价格影响）、就业人数份额、工作时间份额等多种口径的份额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而与此同时服务业上述相应份额开始上升。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不仅来自服务业相对价格的上升，也来自服务业相对真实供给数量的上升。

从时间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结构转型期的次序如下：美国（1950）、加拿大（1957）、英国（1960）、法国（1965）、德国（1969）、日本（1970）、澳大利亚（1970）、西班牙（1972）、意大利（1976）、中国台湾（1986）、韩国（1992），进入结构转型期的收入临界点在7400~12000国际元之间，多数集中在9000国际元左右，工业增加值份额峰值处于34%~53%之间，多数在40%左右，城市经济体中国香港最低34%，德国最高53%。

从人均收入角度看，中国跨过了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收入门槛。为了便于国际比较，笔者使用与上述文献中一致的人均GDP度量口径，即1990年国际元。作为参照，笔者还同时列出了人均GDP的名义值（美元）。其中，以

---

① Herrendorf B, Rogerson R, Valentinyi A.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

② 欧盟15国、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研究结构转型问题需要用到较长的历史数据，目前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数据来源如下：Maddison（2010），EU KLEMS， Word Bank Indicator，National Accou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Penn World Tables， OEC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Data。收入水平、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数据相对容易获得，消费支出的分解在很多国家没有历史数据。

③ 即1990年1单位美元的购买力。

1990年国际元为计价单位的人均GDP来自麦迪森（Maddison）项目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数据更新至2010年，2011—2016年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不变价人均GDP增速推算得到。人均GDP的名义值（美元）来自国家统计局，汇率采用当年年末汇率。按照1990年国际元口径计算，中国2010年人均GDP为8032国际元，达到国际经验中发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收入门槛临界值，2016年人均GDP为12130国际元。

从增加值份额看，中国已经跨过工业化高峰期，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现价工业增加值[①]占全部现价增加值的份额在2006年达到过去三十年的高点42%，此后开始持续下降，2016年下降至33.3%。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较短，只能看到2004年以来的数据，2007年制造业增加值份额达到高点32.9%，此后开始持续下降。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不变价工业增加值份额在2010年达到高点42.7%，此后缓慢下降，2015年下降至40.1%。不论是现价还是不变价，服务业份额都在持续上升。

从就业份额看，中国已经跨过工业化高峰期，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中国缺少较长时间序列的制造业就业份额数据。目前能够获得的相关就业数据包括：过去30年的第二产业就业份额[②]；2006年以来的城镇制造业就业份额；2008年以来的农民工制造业就业份额；以及过去30年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的高点是2012年的30.3%，此后开始下降；城镇制造业份额相对稳定，自发布统计数据以来一直在28%~29%之间；农民工制造业份额自2008年发布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37.2%下降至2014年的31.3%。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在过去30年中持续上升，2008年以来上升势头加快，1985—2007年期间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平均每年增加0.7个百分点，2008—2014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从就业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是在2008—2012年之间。

---

① 工业包括制造业、采掘业以及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80%以上。现有统计数据中，工业增加值时间序列较长，可以作为反映制造业增加值份额长期变化轨迹的代理变量。

② 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

以上基于收入、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等多方面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度过了工业化高峰期。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变化轨迹和水平值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高度一致。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变化轨迹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高度一致。主要的差距在于第一产业就业份额水平值高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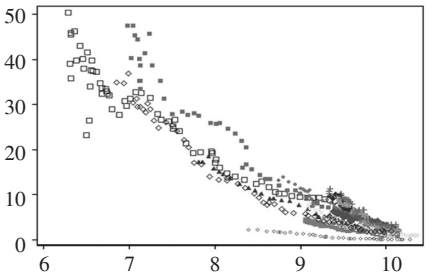

图1(a)　第一产业增加值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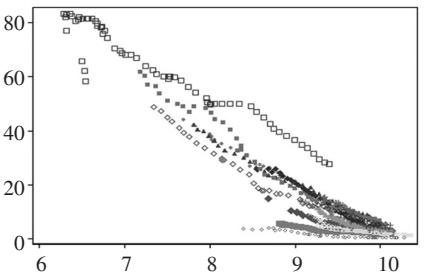

图1(b)　第一产业就业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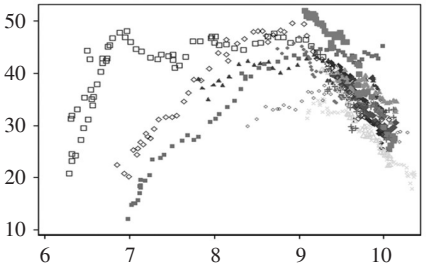

图1(c)　第二产业增加值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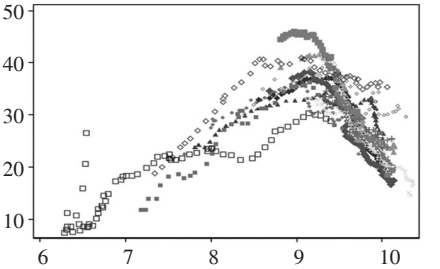

图1(d)　第二产业就业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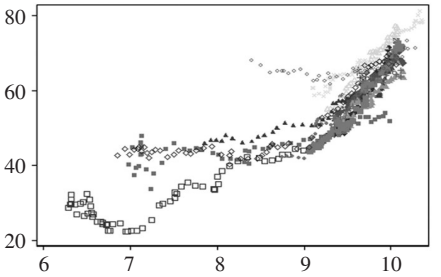

图1(e)　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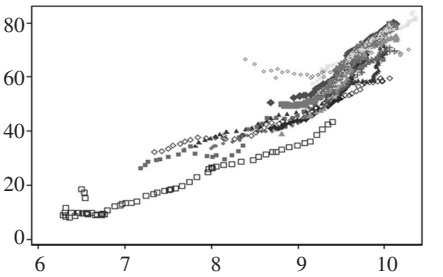

图1(f)　第三产业就业份额

注：横轴是1990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国际元的对数值。空心正方形代表中国，其余样本国家（地区）还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芬兰、比利时。

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崛起

Buera 和 Kaboski（2012b）[①]观察到，美国经济从1950年开始转型至今，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60%提高到80%，增加了20个百分点，其中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份额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低技术水平的服务业份额下降。他们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定义是依据该行业雇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其他高收入国家（地区）也有类似经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13个经济体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较多使用人力资本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政府服务等行业无论是增加值占比还是就业占比都在持续上升；较少使用人力资本的贸易、餐饮和酒店，运输、仓储、交通和信息增加值占比则是下降或者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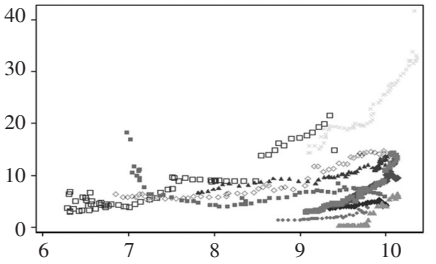

图2(a)　增加值：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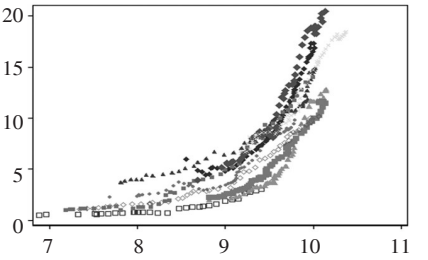

图2(b)　就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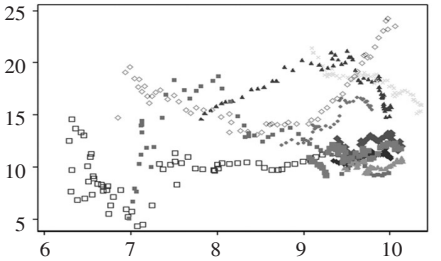

图2(c)　增加值：贸易、餐饮和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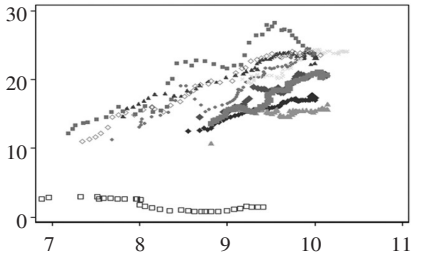

图2(d)　就业：贸易、餐饮和酒店

① Buera F J, Kaboski J P. The Rise of the Service Econom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b, 102 (6): 254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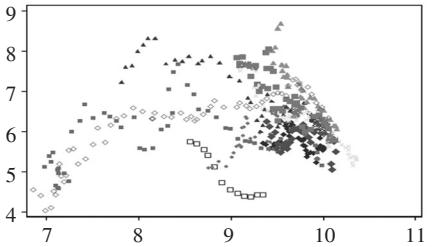

图2(e)　增加值：运输、仓储与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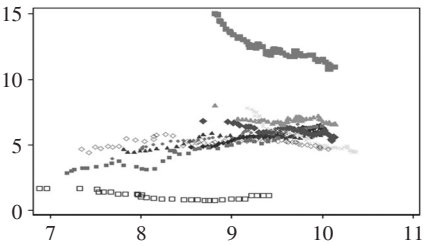

图2(f)　就业：运输、仓储与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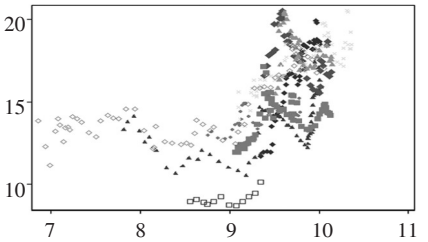

图2(g)　增加值：政府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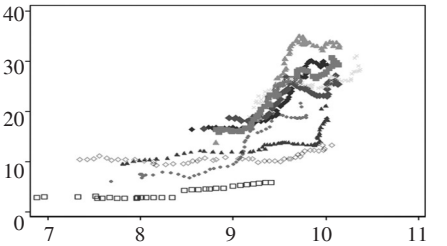

图2(h)　就业：政府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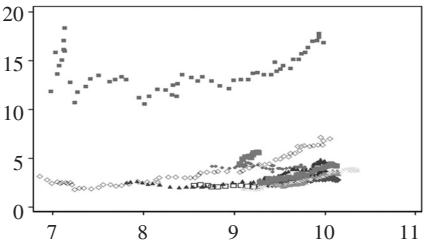

图2(i)　增加值：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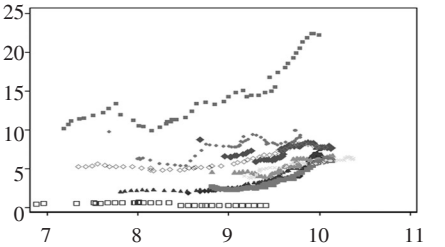

图2(j)　就业：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

注：图中横轴为人均GDP对数值（Maddison），纵轴为细分服务业占比（增加值/GDP；就业/总就业）（GGDC 10 SECTOR DATABASE）。方框表示中国，其他国家（地区）还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

从增加值增速看，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中国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速快于GDP增速。2011—2016年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最快的依次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址勘察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以上行业平均增速超过15%；接下来是房地产，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些行业平均增速均超过10.4%的GDP名义增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

织、住宿和餐饮的平均增速均低于10.4%的GDP名义增速。行业间的差异表现说明，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人力资本/技术密集行业较GDP增速有更高的增长，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稍高或者低于GDP增速，这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类似。与其他人力资本密集行业相比，同样需要较多人力资本投入的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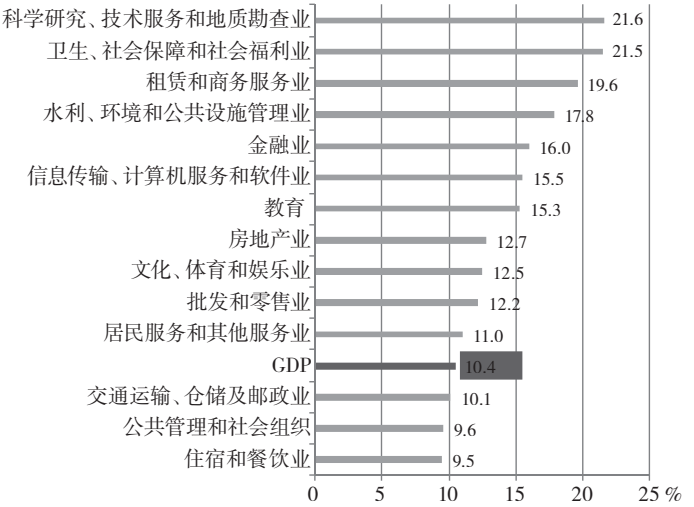

图3　2011—2016年行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与名义GDP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国际比较当中，笔者使用Groningen大学提供的包含33个国家1950—2013年的长时间序列数据库。这一数据库最大的优势在于给出了长时间（1950—2013年）、分部门的增加值和就业数据，其中属于服务业的包含（1）贸易、餐饮和酒店；（2）运输、仓储和通信；（3）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4）政府服务①；（5）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②。中国公开发布的服务业分类

① 对应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3.1版中的L–N项：公共行政与国防、强制性社保，教育，健康和社会工作等，https://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t.asp?Cl=17。

② 对应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3.1版中的O–P项：其他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活动，以私人家庭为雇主的活动以及私人家庭的无差别生产活动，域外组织及机构，https://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t.asp?Cl=17。

与上述分类有显著区别，不能做到一一对应，将中国数据重新分类合并后[①]，与之进行比较。

对比结果显示，中国在各大类服务业就业的占比都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这与此前看到的中国整体服务业就业占比偏低的现象一致。与高收入国家类似阶段相比，服务业就业当中的贸易、餐饮和酒店、政府服务就业占比差距最大。增加值占比方面，比较突出的差别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服务占比偏低；二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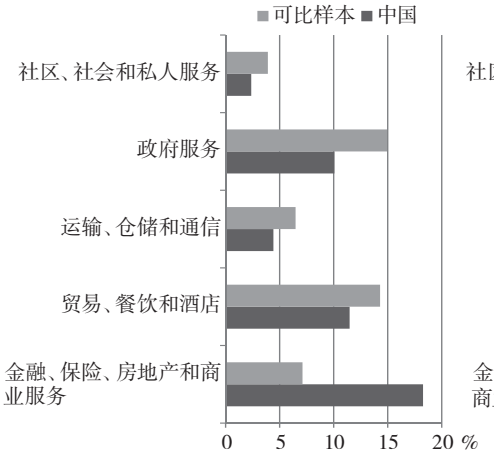

图4(a)　服务业行业增加值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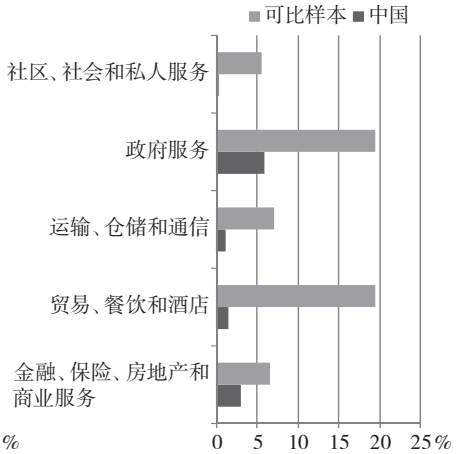

图4(b)　服务业行业就业占比

注："可比样本"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共计13个经济体，人均收入处于11000~13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Groningen大学产业数据库，http://www.ggdc.net/dseries/10-sector.html，国家统计局。

① 具体合并对应方式如下：将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对应于（1）"贸易、餐饮和酒店"；"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对应于（2）"运输、仓储和通信"；"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对应于（3）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对应于（4）"政府服务"；"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应于（5）"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

四、制造业升级

在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依然是推进生产率进步的重要源泉，依然对其他部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正面溢出效应。目前，没有一个能够反映制造业升级状况的综合指标。下文从研发投入和专利、生产过程、产业和产品等多个维度观察，得到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状况的方向性判断。

（一）投入环节：研发投入和专利

魏尚进、谢专和张晓波[①]（2017）整理了中国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数据并进行了国际比较。产业升级需要国家或企业在研究开发（R&D）上大量投资。中国1991年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是0.7%。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中位数，到2012年则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均值（2012年是1.88%）。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另一个度量创新投入的指标是研发人员的比例。中国1996年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是443人。当时中国的研发人员比例和巴西（420人/百万人）大体相当，高于印度（153人/百万人），低于俄罗斯（3796人/百万人）。美国、日本和韩国每百万人口的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3122人、4947人和2211人。中国2014年的研发人员比例上升至每百万人口1113人。

产业升级离不开创新，专利是衡量创新的重要维度。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从1995年的8万件上升到2014年的230多万件，年均复合增长率19%。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于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接收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这三类。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发明专利，其授权数量在所有专利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了2014年的18%。2005年，授权给外国申请人的专利占

① Wei, Shang-Jin, Zhuan Xie, and Xiaobo Zhang. 2017. From “Made in China” to “Innovated in China”: Necessity, Prospect,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1): 49-70.

比超过20%，而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7%。这说明2005年以来，自主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能够说明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中国的专利增长同样很快。中国企业申请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从1995年的62件增长到2014年的7236件。1995—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是21%，2005—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上升至38%。

（二）生产环节：中间品使用、产业集中度

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提出提高效率的重要源泉是专业化和更细密的分工。钱纳里等（1989）结合众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指出："工业化期间，尤为重要的是中间投入品的变化，中间品在生产中的使用增加，表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产业联系的复杂程度都在提高。这种发展趋势是工业化的确定性特征之一。"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提升是专业化分工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标志。

中国工业部门的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在持续提升。基于投入产出表[①]可以计算得到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占该行业产出的占比。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70.7%上升到2014年的78.2%。各细分行业的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即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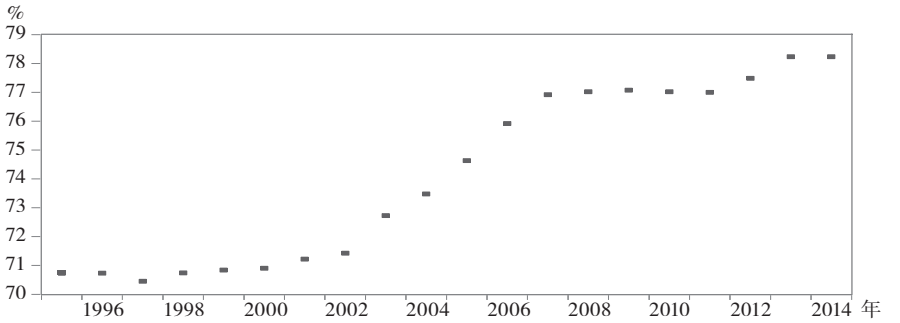

图5　第二产业中间投入占比

注：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① 最新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只能更新到2014年。

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工业部门中间品投入占比上升的进程并未因此打断，工业部门的专业化细分还在继续。

低效率企业淘汰，行业集中度提升。市场竞争带来优胜劣汰，更高效率企业占据更高市场份额，同时也带来了行业整体效率提升。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工业部门面临需求增速放缓和严重的优胜劣汰压力，大量低效率企业被淘汰，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华泰证券的报告（2017）[①]以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口径计算了CRn指数[②]，对比2016年和2010年，一级行业中极高寡占型行业数量由6个增加到9个，低集中寡占型行业数量由10个增加到15个。采掘、纺织、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大量企业被淘汰。

（三）产品环节：出口产品复杂度、出口增加值率

出口是反映国家制造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面镜子。从出口数据透视制造业产品生产能力有多个维度，比如出口复杂度[③]（Rodrik等，2006）、高新产品出口占比等。根据张斌、王雅琦、邹静娴（2017）[④]的测算，以出口复杂度衡量，中国2000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14643美元[⑤]，2014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24014美元。2010年以后，中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仍保持了持续提升。

张斌、王雅琦、邹静娴（2017）[⑥]基于生产链和出口增加值率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率持续上升。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行业内效应，而非行业间效应[⑦]。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专注于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的产品。这与大类产品出口层面上的观察相一致，仅从出

---

① “行业集中度：格局重塑，以龙为首”[R].华泰证券策略报告，2017-08-22。

② 一种衡量行业集中度的指标，即行业内最大的前n个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之和。

③ Rodrik, Dani and Hausmann, Ricardo and Hwang, Jason,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anuary 2006).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5444.

④ 张斌, 王雅琦, 邹静娴. 从贸易数据透视中国制造业升级[J]. 国际经济评论, 2017(3):13-27.

⑤ 中国收入水平远低于出口复杂度所对应的收入水平，对此进一步解释参见Rodrik（2006）。

⑥ 张斌, 王雅琦, 邹静娴. 从贸易数据透视中国制造业升级[J]. 国际经济评论, 2017(3):13-27.

⑦ 行业内效应指出口同类产品，更多的国外进口中间品被国内生产中间品替代；行业间效应则指出口产品当中更高出口增加值率产品的比重上升，体现为出口产品的结构性变化。

口产品种类上看不到近年来的中国制造业出口有明显升级，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把研发和技术进步的力量主要放在了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产品。

五、消费、投资和出口再平衡

消费在GDP的占比随着工业化发展阶段推进先降后升。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消费占比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高峰期①保持趋势性下降，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开始持续回升。造成消费率上升的并非私人部门消费，而主要来自政府消费。

中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下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1%下降至2010年工业化高峰期的48.5%，此后开始持续回升，2016年上升至53.6%。中国的消费占比变化随着工业化阶段推进先降后升的轨迹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历类似，但是中国的消费占比水平显著低于上述经济体，与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相比大约低了10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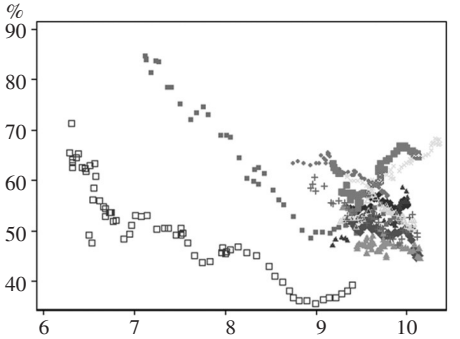

图6(a)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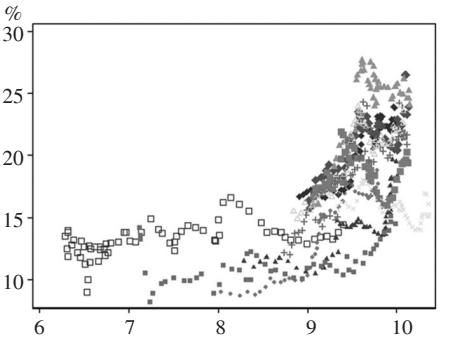

图6(b)　政府消费占GDP比重

注：图中横轴为人均GDP对数值（Maddison），纵轴为各国消费（居民、政府）占GDP比重（WDI, World Bank）。方框表示中国，其他国家和地区还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

① 以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峰值确定。

私人消费占比水平仍偏低。最终消费包括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二者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近十多年来一直稳定在74%和26%左右。中国政府的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14%，从比较视角看，与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等接近，低于日本和欧元区；居民部分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39%，远低于其他国家（地区）50%以上的占比。固定资本形成在GDP的占比随着工业化发展阶段推进先升后降。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高峰期持续上升，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开始下降。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在GDP的占比与上述经济体的经验类似。固定资本形成占比20世纪80年代初为30%，此后不断抬升，2010年达到45%的峰值，此后停止上升步伐，开始缓慢下降，目前仍停留在较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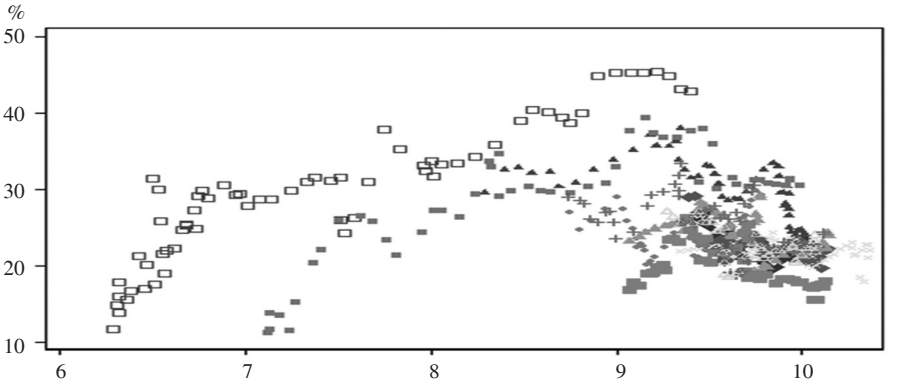

图7　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

注：图中横轴为人均GDP对数值（Maddison），纵轴为各国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WDI, World Bank）。方框表示中国，其他国家和地区还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

工业投资占比下降，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投资占比上升。细分行业来看，工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自2008年以后从36.3%下降到33.6%；建筑和房地产投资占比近十多年来一直在25%左右小幅波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自2011年后从22.3%上升到25.8%。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包括三类：（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包括市政设施管理、供水设施管理、公交设施管理、园林设施管理、环卫设施管理等）在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占比最大，2016年达到37.3%。从增速变化来看，2013年以来（1）和（2）持续下降，（3）的增速高于（1）和（2）且没有持续下降，2016年（1）、（2）、（3）的增速分别达到12%、10%和23%。农林牧渔、科教文卫以及其他（包括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投资占比较低，2010年以来保持持续上升走势。

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市场份额增速对出口增长贡献下降。出口增速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全球出口市场增速，这主要来自全球需求增长以及全球贸易一体化程度提高；另一部分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增速。2000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15.4%，其中8.4个百分点来自出口市场份额增长的贡献，7个百分点来自全球出口市场增长。近十多年来，出口市场份额增长速度在持续收窄。出口市场份额增长放慢会直接带来出口增速放慢。2009—2016年期间，由于出口市场份额增长带来的出口平均增长5.2个百分点，远低于2000—2008年危机前阶段的平均12.5个百分点。

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增速下降与收入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与高收入经济体以往的经验基本一致。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呈现驼峰型变化轨迹。基于1948—2013年17个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出口市场份额随人均收入增长主要呈现出口驼峰形变化轨迹。主要发达经济体到达出口市场份额峰值的收入临界点在7800~200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之间，多数集中在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中国过去十五年的出口市场份额增速持续下降做趋势外推，中国在2020年前后的市场份额接近零增长，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达到峰值，届时的收入水平在14500国际元左右。这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基本吻合。

六、差　距

基于以上观察，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2）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偏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3）官方口径下的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

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城市化率。中国截至2016年的官方按照常驻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为57.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高收入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市化率都达到了70%以上。中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镇率仍在持续攀升，即便如此城市化率还是大大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较低的城市化率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形成了对应。政府服务占比偏低同样与较低的城市化率有关。比较而言，城市较农村会提供更多的政府服务，较低的城市化率与政府服务占比较低形成了对应。

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相比，中国较低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较低的政府服务附加值占比和较低的城市化率，以及较高的投资率主要来自政府“重发展、轻服务”的职能定位以及相关改革措施不到位。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公共资源投入更加看重当地GDP和税收增长（周黎安，2007[①]），这紧密关系到地方官员升迁和官员集团福利（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②]）。这个激励机制导向下，政府更看重建设项目，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投资占比过高以及投资当中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缺少必要的激励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更

①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② 徐现祥，王贤彬.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J].经济学（季刊），第九卷第4期，2010：1447–1466.

多被政府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的意愿和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可以依靠市场提供的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当中的很多服务受制于过度管制政策不能充分发展①。城市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充分，再加上土地、户籍等政策改革不到位，使得城市对于众多农村人口只能是个暂时的工作地点，而不能长久地安定生活。这解释了为什么城市化率偏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偏低，以及政府服务与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过低。

七、小　结

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增长的烦恼，也存在对未来增长形成瓶颈的真正问题。通过比较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变化轨迹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制造业增速放缓、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更快发展、消费占比上升、出口增速下降等现象都是走向更高收入阶段的规律性现象，这些现象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高度一致。

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真正差距在于中国较低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较低的政府服务附加值占比和较低的城市化率，以及较高的投资率。弥补差距，政府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随着中国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型，政府职能需要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把工作重心从项目建设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只有社会各界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有效监督和问责，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激励机制。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信息和技术保障。

① 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张斌. 从制造到服务[J]. 比较，2015(5).

The Progress and Gap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ZHANG Bin
(China Finance 40 Forum)
ZOU Jingxi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progress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similar development stages of high-income economies. China's economy has crossed the peak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from 2010 to 2012, and economic activity is shifting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 After the peak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many links of input, production and product show that the overall posture of the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good, the human capital 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y has a faster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xport are more balanced. These structural changes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high income economies at similar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dicating that China is still on the normal track of higher income levels. The gap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low employment ratio of the second, third industry; the ratio of the government services to the lower ratio and the higher ratio of the added valu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low proportion of the private consumption and the higher investment ratio, especially the high invest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category. To bridge these gaps, we ne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from development to service,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urbanization rate.

Key word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ransnational Comparison, "Make Up the Short Board"